



*Body, Gender and Idea
in Black Women's Literature*

身体、性别意识与 黑人女性文学

——酷儿理论视域下的女性书写

李雪梅◎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Body, Gender and Idea
in Black Women's Literature*

身体、性别意识与 黑人女性文学

——酷儿理论视域下的女性书写

李雪梅◎著



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梳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概貌、女性书写历史以及罗列托妮·莫里森和艾丽丝·沃克的作品中性的异态化现象，以酷儿理论为主要视域，还原隐藏在这些异态化背后的人性之美、和谐之美、情愫之美、抗争之美，从而使读者对黑人生活和乃至黑人文化有一个正态的认识，对美国当代黑人文学有一个完整的解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性别意识与黑人女性文学：酷儿理论视域下的女性书写 / 李雪梅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当代外语研究论丛)

ISBN 978 - 7 - 313 - 15535 - 1

I . ①身… II . ①李… III . ①黑人—女性—文学研究—
美国 IV . ①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7765 号

身体、性别意识与黑人女性文学 ——酷儿理论视域下的女性书写

著 者：李雪梅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 - 64071208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23 千字

印 次：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313 - 15535 - 1/I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769 - 85252189

前 言

美国黑人文学是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黑人文学记录了黑人被奴役、被迫害的命运，渲染了黑人为自己解放而勇于斗争的精神，从而成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评论家关注黑人文学作品，大多从黑人悲惨命运的角度和抗争的视角解读作品，评论家也往往重视黑人文学的社会意义，而忽视其中的艺术价值，黑人文学被当成一种捍卫民族、性属和个人的武器，黑人作家被看作是负有特定任务的群体，黑人文学成为抗议文学，没有一部小说不是抗议小说。而且，当主流美国文化把黑人排斥在外的时候，黑人为了争取白人的承认也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模式，为了证明黑人与白人同样也是人，黑人文学抹杀了黑人的特殊性与独特性，抹杀了黑人与白人在种族、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经过长期斗争，主流文化的大门终于开始向黑人文学洞开，黑人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前提了。在黑人文学中从追求“平等”的文学主题转而寻求和肯定具有黑人自己的文化特色。黑人世界固有的生活习惯、家庭伦理道德、宗族和社区关系、生存的方式甚至性生活经验史等等这些逐渐成为黑人文学中独特的风景，从某种程度上讲，黑人自身的特性不再成为耻辱的标志，而是唤醒和正视自身的一种自信。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黑人女性文学呈现出其独

特魅力,特别是黑人女性文学基于身体、性别意识的表达,完成了反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制的任务。黑人女性文学源于黑人文学,又一枝独秀。黑人女性作家的视觉、写作手法、表现方式与男性作家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也逐渐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

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女性性异态现象,黑人女性生活在社会最低层,为了维护家庭和子女、崇尚精神自由以及表达一定的政治诉求,身体成为她们唯一的本钱,这种异于传统价值文化的表达方式,酷儿理论能够很好地阐释这种现象。

“酷儿理论”是著名女权主义者美国加州大学桑塔·克鲁斯(Santa Cruz)分校的教授罗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提出的,酷儿理论是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对人类的性向、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进行了质疑,提出人的性别身份是由社会建构的,而不是天生的。著名的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继承和发展了罗丽蒂斯、威蒂格(Monique Wittig)等激进女性主义者的理论,综合了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身份政治和话语政治、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和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的种族的结构关系,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她深入研究了传统社会在身份问题上的排他性和强制异性恋体制,揭示出男权社会对女性,性异态群体的压迫。

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长期被遮蔽在男性作家的阴影之下,直到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于1970年发表了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引起美国文坛的关注,随后,她先后发表了小说《秀拉》、《所罗门之歌》等多部小说,并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关于莫里森作品的研究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学者从叙事学的角度,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从神话原型阐释学的角度,从种族政治身份的角度,还有从意象的角度,小说主题角度对莫里森的作品进行了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当然,在莫里森的作品研究选题上,存在着学术扎堆现象,重复选题比较多,有些论述难免缺乏新意(田亚曼,2012:2-6)。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是美国当代另一位著名的黑人作家,以其作品《紫色》为代表,也成为文学评论的热点,学者们从种族和性别的角度,从妇女主义的角度,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甚至从家庭暴力的角度对艾丽丝·沃克的作品

进行了解读。但到目前为止,由于酷儿现象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抵触,人们对酷儿现象讳莫如深,因此,很少有作品从酷儿理论的视角去阐释广泛存在于美国当代黑人文学作品中的开放和反归类的人群及其性现象。随着我国新一届领导人正常接待冰岛总理同性夫妇来华访问,这标志着官方已经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性异态现象,在我国将酷儿理论引入文学批评,将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国内文学批评方法,扩大文学鉴赏视野,对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实存在的性异态现象,将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性/别是酷儿理论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它包括性和性别两个方面主题,分涉两种不同却又密切相关的权利关系,性/别表达了“性”的一般特性,和“性别”中有明显的差异的概念,除了有男女跨性之别,还有各自内部差异,也有同性恋、异性恋和其他多种恋之别,各种恋内部的差异。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中的怪异现象,比如,多年的种族压迫,使黑人男性逃离责任,缺失于黑人家庭,黑人女性在黑人社区和家庭里担当了双重性别角色,导致的性别模糊;来自男权异性恋单一的社会体制的影响,黑人女性常遭受黑人男性的摧残,她们通常转向同性伙伴中寻求安慰,产生的性相不稳定、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现象;由于种族压迫,经济穷困,精神崩溃以及性别压迫,在黑人家庭中,乱伦、暴力、遗弃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酷儿现象广泛存在。脱离了对种族压迫分析这一个大前提是不能深刻解读黑人女性文学的。因此,结合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批判,黑人文学作品的酷儿阅读才能够更真实、更准确地把握黑人女性文学中的精髓。

本书主要以梳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概貌、女性书写历史、罗列托妮·莫里森和艾丽丝·沃克的作品中性的异态化现象,以酷儿理论为主要视域,还原隐藏在这些异态化背后的人性之美、和谐之美、情愫之美、抗争之美,从而使读者对黑人生活和乃至黑人文化有一个正态的认识,对美国当代黑人文学有一个完整的解读。

多年以来,笔者致力于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的研究,特别是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研究。2013年、2014年笔者分别主持了四川省社科联高校外国语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项目“酷儿理论视域下的黑人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身份诉求”和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社科项目“酷儿理论维度的托妮·莫里森作品研究”两个项目,在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两个项目均已完成,其中省



当代外语
研究论丛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外国文学研究系列 | 身体、性别意识与黑人女性文学

社科联项目以优秀结题。通过这两个项目的研究,使我能够系统地运用酷儿理论的视域来解读部分黑人女性作家的文本,特别是比较深入地走进托妮·莫里森的作品之中,系统地对照研究。本书的内容既是笔者关注黑人女性文学的心得,也是上述两个基金项目的直接研究成果和后续研究成果,部分内容业已公开发表,但作为一个视域来解读黑人女性文学是一项庞杂和系统的工程,酷儿理论的内涵也在丰富和完善之中,限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一研究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对于笔者来说,这项研究还在路上。

目 录



第1章 女性书写的主题 / 1

- 1.1 女性书写的内涵 / 1
- 1.2 女性书写的逃离主题 / 12
- 1.3 女性书写的母女主题 / 19
- 1.4 女性书写的文化冲突主题 / 28
- 1.5 中西方女性书写的对比 / 35

第2章 抗争、自我和包容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 / 46

- 2.1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母体 / 46
- 2.2 早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 / 51
- 2.3 现代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 / 54
- 2.4 当代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 / 62

第3章 专为边缘群体赋权的酷儿理论 / 71

- 3.1 酷儿理论的诞生与发展 / 71
- 3.2 酷儿理论的思想源流 / 73
- 3.3 主要的酷儿理论思想家 / 94
- 3.4 酷儿理论与黑人女权主义 / 122



当代外语
研究论丛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外国文学研究系列 | 身体、性别意识与黑人女性文学

第4章 托妮·莫里森的酷儿书写 / 129

- 4.1 身体的贬损与解构 / 129
- 4.2 《所罗门之歌》的伦常禁忌 / 138
- 4.3 正常心灵与女性的《天堂》 / 147

第5章 艾丽丝·沃克的酷儿书写 / 160

- 5.1 “妖女”——秀拉和莎格 / 163
- 5.2 身体的诉求与突围 / 169
- 5.3 性别的道德酷儿 / 177

第6章 黑人女性书写的文化与叙事 / 183

- 6.1 女性书写中的黑人社团 / 183
- 6.2 女性书写中的文化意指 / 190
- 6.3 苦痛记忆的碎片化叙事 / 197
- 6.4 黑人文化的精神传承——母亲 / 205

参考文献 / 212

主题索引 / 224

后记 / 226

第1章 女性书写的主题



1.1 女性书写的内涵

1.1.1 女性主义

世界近代以来,追求男女平等的妇女解放运动构成了世界发展史一个多姿多彩的组成部分,广义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包括各领域、各层面的为争取妇女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各种努力。然而有影响且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当属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Feminism)又称女权(女权主义)、妇女解放(女性解放)、性别平权(男女平等)主义,是指为结束性别主义(sexism)、性剥削(sexual exploitation)、性歧视和性压迫(sexual oppression),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批判之外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性底层的权利、利益与议题(百度百科)。女性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社会运动。人们认识到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处于第二性地位。在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作为第二性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是如此。传统性别思想认为,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是现实存在而且也不

会改变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与男性思想不同的是,女性主义认为,性别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变的,因为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和文化人为地建构起来的。

在男性占统治的社会里将女性这一性别视为低下的、附属的和第二性,女性只能通过挑战男性的固有地位秩序来改变自身的性别地位。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虽然男性也受压迫,但他们是由于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成员而受压制,而不是因为是男性而遭受压制。女性则与其不同,除了男性所可能遭受的阶级和阶层压制之外,还背负了仅仅因为是女性而受到的压制。女性主义走过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历程,斗争的阶段像波浪一样,前仆后继。

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发表了《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可以看作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序幕。《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中明确宣告:“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义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以及“第三波女性主义”。与此对应的妇女解放运动大致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女性主义的发展经过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当中国还处于鸦片战争的初期,美国却诞生了世界第一个女权主义的组织——美国全国妇女选举协会(the 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这一阶段主要是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由于历史、宗教、习惯、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女性在政治上和男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除了参与社会的众多机会和男性处于完全不平等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一个国家公民,女性没有基本的政治权,没有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也受到极大限制。1792年,英国著名学者、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发表了《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通过了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女权主义纲领《权利与决议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and Resolutions)。她在书中对18世纪那些试图否认女性教育的理论家进行了回击,主张女性的教育程度应当相称于其社会地位,女性能够成为与丈夫心智平等的伴侣,她们应该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基本权利,而不应被视为社会的装饰品或是婚姻交易中的财产。

(刘岩,马建军,张欣等,2012: 21)。《宣言》的核心内容是“确保妇女神圣的选举权”、“一切把妇女置放于男人之下的法律都严重有悖于自然的伟大法则,因而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和权威”、“女人和男人一样有权利和义务用正当的手段去追求正义的事业”(Sheila Ruth, 1997: 519)。决议呼吁造物主赋予妇女更广阔天地。这个阶段以女性争取到选举权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的妇女普遍获得了选举权,美国的妇女于1920年也获得了选举权。

这一时期,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话语,但是有两位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却给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她被誉为“当代女权主义之母”。她的“双性同体”的思想否定了社会性别身份是一成不变的观点,同时,她关注妇女文学创作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在《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里,表达了女性创作应该探索女性自己的经历,而不是套用男性的经历。她的著作推动了女权主义的事业。另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是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她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社会塑造出来的,塑造女人的是整个文明。”(西蒙·德·波伏娃,1998: 45)她揭示了在男权社会里,男人被当成“本体”,女人是“他者”,其统治地位确定了女性服从男性的思想意识,男性从立法、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以及一些现代医学来捍卫男人的主导地位,以此来说明妇女的从属地位是天生的。在她的著作中,区分了人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把妇女从本质上解放出来,昭示了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到来。

第二次浪潮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男人们都到了战场上,而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填充男人空缺的劳动岗位,充当起男人原来的社会角色,国家也动员妇女要为国作贡献,部分妇女还直接到前线。原来男人担当的所有社会工作,女人都能承担。但是战争结束后,男人们从战场上回来了,男人们夺回了原来属于他们的社会角色,女人只能又回到家里。这种状况使女人非常不愉快,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浪潮。这次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很快,到了70年代改变了很多社会观念。

第二次浪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吉尔梅·格里尔(Germaine Greer)、舒拉密丝·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和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等。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揭露了呈

现在当时美国社会的一种虚假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待在家中的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不满足于做男人笼中的“金丝鸟”，她们由于脱离社会，虽然衣食无忧，但是心理压抑、生活空虚、自我封闭、情感失落，展现了美国妇女在法律上获得选举权以后，再次跌入父权文化的陷阱。正如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所宣称的那样：“当妇女们最终自由地成为她们自身的时候，有谁知道她们能成为什么呢？当妇女们不摒弃爱情就能培养自己的才智时，有谁知道她们这种才智将奉献出什么来呢？当男人和女人不仅分享孩子、家庭和花园，不仅分享他们生物作用的满足，而且分享工作的责任和热情，这种工作将创造人类未来以及他们是谁这种完美的人类认知时，有谁会了解这种爱的希望呢？妇女们的自我探寻已经开始了。女性奥秘的喧嚣再也不能湮没这种驱使妇女们日趋完美的内心呼唤的时代，已经指日可待了。”（贝蒂·弗里丹，1999：448）女作家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觉醒》很好地阐释了她的理论，中产阶级妇女埃德娜脱离丈夫为她准备的优渥的家庭生活，独自来到新奥尔兰生活。对她来说，婚姻就是一个“牢笼”，妇女的独立应该走出把女性看成财产的父权制的家庭。

另一位女性主义代表吉尔梅·格里尔在《女宦官》中提出了性自由、性解放的思想，拔高了女性意识在女性能动性中的地位，相对于贝蒂·弗里丹来说，她的思想已经进了一步，不是逃离，而是主动寻求幸福。舒拉密丝·费尔斯通是美国激进妇女组织“红袜子”的发起人之一，她们不满足妇女获得选举权这类空洞承诺。在她的《性别的辩证法：女权主义革命的个案研究》一书中，她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类阶级压迫的根源在于男女两性生物划分，要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是把妇女从传统的母职中解放出来，即改变现存的社会和家庭结构，让家庭解体。她的“革命终极目标”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思考”。然而，凯特·米利特的身体政治在当时格外具有轰动效应，至今仍然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她关于性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狂澜。在她的《性政治》中，以著名男性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诺曼·梅列（Norman Mailer）、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等小说的文本为研究案例，深刻剖析了小说人物性行为中的政治性，指出“性事里含有经常被人忽略的政治问题。”（Kate Millet, 1994: 229）男人对女人的性欲望、性占有包括从身体到语言，从场景

到物品都烙上深刻的政治印记。第二次浪潮是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的，旨在消除以性别为出发点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歧视，废除男性的性别特权，打碎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性别枷锁，建立男女平等的人类社会。如果说第二次浪潮仍然具有局限性，那么第三次浪潮的革命性就更加彻底。

第二次浪潮的批评热火朝天地进行，但是，女权主义并没有结束父权制，根除性别歧视，妇女仍然受到剥削和压迫。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女权主义开始追问一系列传统的问题，最终导致后现代主义阶段女权主义的产生。第三次浪潮，一般产生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这个时期，女性主义内部呈现多样化发展，走上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出现了各种流派。比如，后现代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同性恋女权主义、酷儿理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性别政治等。

第三次浪潮同先前的女性主义一样，关注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权利，但是更加注重妇女身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认为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者们所关注的中心过于狭窄，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体验，而忽略了少数族裔和同性恋妇女的体验，主张妇女勇于探索性，选择性，要求女性主义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灵活性以及可行性。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性属以及身份政治是第三次浪潮追问的主题。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爱丽丝·贾汀 (Alice Jardin)，她创造了“创女纪”这一术语，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妇女”进行分析，通过追溯希腊哲学经典著作中的性别关系，她认为决定人们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存在于男性和女性这对根本的二元之间，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上的，妇女被压制被剥削的社会地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被“自然化”。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三驾马车——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伊里加瑞 (Luce Irigaray)、西苏 (Helene Cixous)——都认同权利是通过制度与话语在女性身体上施加力量的观点。她们都认为在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下，女性的身体被掩盖，被循环利用，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女性的欲望和表达受到了压抑。伊里加瑞的理论直指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对传统哲学话语进行了解构。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中她批判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所有西方主要哲学家，认为父权制依靠内化的男性形象确立其社会关系，根据男性的自我定义去反观

和定义女性,将女性构建成男性的他者和对立面,使其丧失主体性,倡导独立于男性标准以外重新构想女人和女性特征。她指出,在西方哲学中,他者的意义被简化为主体投射在他者上面的意义,女性的身体成为反射菲勒斯中心主义同一性的镜面,认为男性把女性泯灭为自己的“反射镜”,使得女性缺乏独立主体和特质。朱蒂斯·巴特勒是第三次浪潮中影响巨大的人物之一,也是酷儿理论的奠基人,她的性别操演理论为揭露社会性别的虚假性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将会在酷儿理论章节里详细论述。

在英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发展女权主义主张,而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关注话语和身体,试图解决女性主义理论话语权。女权主义扩展到了哲学、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多个领域。在这波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性别与阶级是各流派争论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强调经济因素对妇女被压迫地位的影响,而忽视两性关系的作用。而激进女权主义者强调两性的生理差异,批驳弗洛伊德的阳物中心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在《妇女地位》一书中,认为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女人在生产、生育、儿童社会化与性关系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共同决定的,而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妇女的束缚并不亚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进行“精神革命”。她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相结合,解释妇女思想意识。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把符号学理论引入女性主义批评,进入了女性政治的道路,形成了一套反对西方白人历史中心论、男人中心论和逻各斯主义中心论的女权主义政治实践策略。她反对将女性看作同质的、普遍的,反对将“女性特质”等同于生物意义上的女人,不主张将父权和女性话语视为两个无法相容的存在。她的理论为女性主义批判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高度重视妇女个人权利,喜欢通过大众文化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有不少的批评者认为第三次浪潮的政治性不够,这种个人化的哲学重视个人权利胜过行动,有碍于促进社会变化。也有学者认为第三次浪潮聚焦于身份问题,这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且,第三次浪潮“把妇女的性与权利等同起来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作用。这种性的权利纯粹是个人问题,不会导致社会的变化,反而可能促使妇女性化。”(程锡麟、方亚中,2011: 12)

女权主义的第三次浪潮,从名称本身来讲,如潮水一般,荡涤了一些藏

污纳垢的地方，并且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潮水本身却面临着退潮，不能持续，甚至力量和方向也单一。这也许是最早使用女权主义的第三次浪潮这个词的艾丽丝·沃克的女儿吕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所始料不及的。因此，这恰好形象地描述了女权主义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是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两者互为支持。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性主义实践的一种方式，它从人类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女性生活中提取了素材，论证了女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女性主义理论却从理论上、政治上分析了女性的现实社会地位和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指明了女性奋斗的方向，为女性文学提供了研究视野。两者之间相得益彰，齐头并进，为推动女性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欧洲的(与民族的相对而言)思想家在严重的冲突出现时会求助于一种普遍的传统。从这个传统中，产生了一个认识，认为文学的比较可以有助于形成跨国界的、甚至泛人类的关于文学作用的观点。因此，关于比较文学的观点不但表现了普遍性和对语言学家获得语言体系的理解，而且象征一个几乎是无危机的理想王国。(爱德华·W.萨义德,2003: 59)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历史上两次重大的运动中，女性文学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一次是19世纪的废奴运动，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19世纪，美国妇女广泛参加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为解放奴隶和解放妇女而斗争。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许多女性作家，她们以自己的作品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值得一提的是，曾被林肯总统赞誉为“一个小妇人掀起了一场大战的”女性作家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她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激励了北方战士解放奴隶的决心。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继续投入到反种族歧视，争取妇女权益的斗争当中。如果没有妇女的帮助，马丁·路德·金就不会取得那样大的成功。女性文学的作品呈现出体裁多样化的特点，但反映的主题较为集中，表现的阶级、性别、地域、种族、族裔和宗教等因素都作用于妇女身份。

1.1.2 女性主义的文学实践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们，由于传统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没有和男性一样的表演舞台，只有写作或者使用笔名发表作品的机会，文学创作于是

就成为她们的现实选择。由于文学的影响力女性主义的实践把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和方式也就理所当然了。我们把女性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称为女性主义的文学实践。文学实践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女性文学写作,另一条是女性文学批评。这二者应该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女性文学批评的对象是女性文学,其目标是解读、梳理、完善女性文学创作的元素;女性文学批评所建构起来的概念、规则和理念又深深影响着女性作家的创作。早期的女性创作多以迎合男性读者的口味,甚至冒用男性的名义进行创作,女性创作既没有被承认,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然而,这不符合女性主义的目标。女性的创作、女性的独特视角、女性文学中所表现的妇女显然和男性作家所表现的不一样,更有其独特的文学、审美、伦理、文化的价值。在此背景下,“女性书写”概念应运而生。

“女性书写”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提出来的概念,即打破语法规则、反逻辑、反理性、非线性的、不受任何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束缚和制约的书写策略(埃莱娜·西苏,1992: 188)。如西苏所言“女性必须通过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出蕴意丰富的语言,摧毁隔阂、等级、修辞话语、法规条文……”(Hélène Cixous, 1976: 886)“女性书写”成为当代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理论,它是女性主义批评者寻找到的新的批评话语,并成为支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理性的唯一重要前提。(刘岩,2012: 2)女性书写的概念是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整体背景下提出的,该术语适应了女性主义发展进程中对于新的文学批评话语的需要,与同一时期的众多理论术语和批评实践一起推进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促使女性研究全面进入学科体制。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从根本上认清了女性在父权文化中所处的被压抑、被消音的地位,它批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认知方式和再现方式,呼吁女性言说身体和欲望。(刘岩,2012: 6)

根据西苏的描述,女性书写具有开放、变化的特质。首先女性应该解放身体,女性身体具有的流动复杂性自然成为女性书写的要素。其次,女性要从母亲身体里汲取滋养,加强同母性的文化联系,从而颠覆并利用男性秩序和理性逻辑,建构起没有边界的语言模式。第三,写作成为女性书写的主要方式,在特殊的环境中,在特定的传统职业定位秩序模式之下,相对自由的写作模式成为女性书写的有效表达方式。因此,女性书写应该以“给予”为